



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
创新工程学术前沿丛书·第一辑

主 编：黄仁伟 叶 青

世界中国学理论前沿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 编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学术前沿丛书·第一辑

主 编：黄仁伟 叶 青

世界中国学理论前沿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 编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中国学理论前沿/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
研究所编.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6

ISBN 978-7-5520-1236-1

I. ①世… II. ①上… III. ①中国学-研究 IV.
①K20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61785 号

世界中国学理论前沿

编 者: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王 勤

封面设计:黄婧昉

出版发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顺昌路 622 号 邮编 200025

电话总机 021-63315900 销售热线 021-53063735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org.cn

照 排: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印 刷:上海颀辉印刷厂

开 本:710×1010 毫米 1/16 开

印 张:20.5

插 页:2

字 数:335 千字

版 次:2016 年 5 月第 1 版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20-1236-1 / K · 312

定价:7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
创新工程学术前沿丛书·第一辑

编审委员会

主 任

王 战 于信汇

副主任

黄仁伟 叶 青

委 员 (按姓氏笔画为序)

于 蕾 王 振 王玉梅 王海良 方松华 石良平 叶 青 权 衡
朱平芳 刘 杰 刘 鸣 汤蕴懿 孙福庆 李 凌 杨 雄 杨亚琴
何建华 何锡蓉 邵 建 郁鸿胜 周冯琦 荣跃明 胡晓鹏 姚勤华
党齐民 晏可佳 黄仁伟 谢京辉 强 荧

主 编

黄仁伟 叶 青

副主编

朱平芳 汤蕴懿

组 稿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 健 王世伟 方松华 叶 青 权 衡 朱平芳 刘 杰 刘 鸣
李 伟 李 煜 轩传树 何锡蓉 余建华 沈开艳 张维为 周冯琦
周海旺 荣跃明 姚勤华 晏可佳 强 荧

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 工程学术前沿丛书概述

(代序)

当前,社会科学领域正面临大量理论和实践问题,需要理论界的证明和创新。上海社会科学院在“创新工程”的机制下,结合研究生教学和高端智库建设方向,于2015年初正式启动《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学术前沿丛书》项目(下称“丛书”)。本丛书力图反映本学科最新研究成果和理论探索前沿,为研究生理论积累和博士阶段学习提供引导,同时也为授课教师提供基础性材料。

此次组织出版的丛书为2015年院“创新工程”和研究生院共同资助的第一批集中成果。丛书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四个全面”为根本指导思想,以我院首批38个创新团队为骨干编辑撰写。整个申报评审过程秉承了院“创新工程”公开竞争,择优选取、差额资助原则,所有立项申请均委托第三方组织评审,根据申报质量进行差额资助,确定通过名单向全院公示。为确保编撰质量,成立了院领导牵头、各研究所所长组织、创新团队首席专家领衔、院部相关处室协同“四位一体”的组织框架和工作机制,为丛书的顺利出版提供了保障。

在此基础上,2015年到2018年期间,我院将组织编写出版60部左右上海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前沿重点教材,作为上海社科院“创新工程”建设中的重要成果展示平台,也为建院60周年献上一份厚礼。整个项目将分两阶段陆续完成。第一阶段,第二至四年,每年编辑、审定和正式出版学术前沿教材15本左右;第二阶段,后一至二年,结合院“创新工程”各团队标志性成果,新增若干部国内顶级、国际一流的重要系列成果,并对已经出版的前期学术前沿丛书进行必要修订与再版。

本丛书得到王战院长、于信汇书记的全面指导,黄仁伟副院长和叶青副院长策划监督执行,参与本次组织工作的人员包括:朱平芳、佘凌、胡晓鹏、汤蕴懿、王晓丰、杨璇。

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

学术前沿丛书编委会

执笔:汤蕴懿

2016 年元月 1 日

目 录

第一章 导语 中国学研究理论前沿中的若干问题	1
第一节 最新讨论:中国学的相关概念辨析	1
第二节 创新观点:中国学发展之历史逻辑	4
第三节 研究热点:中国崛起与中国学发展	7
第四节 发展大势:共生理念下的中国学研究	10
第五节 基本结论与必要的若干补充	12
第二章 英国顶尖智库最新中国观	14
第一节 关于中国的“全球个性”	14
第二节 关于中国的“崛起问题”	15
第三节 关于中国最近的“积极有为”	16
第四节 欧洲如何面临中国崛起	17
第三章 政治的“适应性”:近年海外中国政治研究述评	19
第一节 中国政治的“适应性”	19
第二节 变革中的“治理”	22
第三节 媒体与治理	26
第四节 公民的政治行为	28
第四章 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道路:战略机遇与合作共赢	31
第一节 中国梦的世界反响	31
第二节 中国道路的经济解读	38
第三节 中国道路:战略机遇与合作共赢	45

第五章 海外中国研究的物质文化转向	56
第一节 物质文化与物质文化研究	56
第二节 物质文化研究在西方	56
第三节 物质文化研究在中国	58
第四节 海外中国研究的物质文化转向	59
第六章 近年来我国环境与健康问题研究热点透视	71
第一节 社会经济转型期的环境与健康问题	72
第二节 热点聚焦:食品安全问题的研究	76
第三节 总结与展望	80
第七章 西班牙汉学研究	84
第一节 西班牙汉学的产生以及一度被遗忘	84
第二节 西班牙汉学:缘起于帝国全球扩张的雄心	86
第三节 18—20 世纪的西班牙汉学	91
第四节 21 世纪的西班牙新汉学	94
第八章 美国学者对中美关系及中国发展的新看法	99
第一节 对中美关系的评价	101
第二节 关于两岸关系的观点	103
第三节 对中国全球角色的看法	106
第四节 评估三种中国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发展	108
第五节 结论	110
第九章 中国学者在核不扩散领域的认知与探索	112
第一节 核不扩散研究的三种视角	112
第二节 关于核扩散起源的研究	114
第三节 关于核不扩散机制的研究	116
第四节 关于美国核不扩散政策研究	118
第五节 关于区域核不扩散问题研究	121
第六节 关于非国家行为体核扩散问题研究	123
第七节 中国学者关于核不扩散研究的主要特征	125
第八节 余论	126

第十章 海外中国经济研究回顾(2011—2015 年)	129
第一节 围绕中国经济超过美国与否的争论	129
第二节 中国经济的下行压力	131
第三节 中国经济发展的全球影响	133
第四节 中国经济发展奥秘的微观解读	135
第十一章 海内外关于“中国梦”的研究	138
第一节 中国梦的思想内涵	138
第二节 中西比较视角下的中国梦	142
第三节 当代中国语境中的中国梦探讨	145
第四节 不同学科方法下的中国梦研究	146
第五节 中国梦的世界意义	148
第十二章 近年来海外汉学研究著作综述	150
第一节 中国史研究的热点	150
第二节 哲学与宗教的研究视角	155
第三节 文学与艺术研究的创新	159
第四节 余论	162
第十三章 日本中国学的新成果及新问题	164
第一节 日本中国学研究基础雄厚且追求网络化	164
第二节 “日本当代中国研究基地联合项目”:研究思路、角度、方法	165
第三节 第一期联合项目研究成果丰硕	168
第四节 围绕“超大国中国”的讨论	170
第五节 日本中国学研究的问题点	172
第十四章 2011 年海外中国研究动态	174
第十五章 2012 年海外中国研究动态	194
第十六章 2013 年海外中国研究动态	250
结语:请不要误判中国	314

第一章 导语 中国学研究理论 前沿中的若干问题

21 世纪以来,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国内外研究机构和大学投入到广义的中国研究中来,欧美传统汉学实现了某种意义上的复兴,国内学术界或者搭建国际性的高端学术对话平台,或者成立相关研究中心及科室,或者面向留学生设立硕士和博士学位点,以多种方式积极开拓中国学研究事业。这些举措,一方面顺应了汉学和中国研究在海外的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推动了“中国学”一词广泛见诸各类报刊和学术文章中,形成前所未有的舆论助力。然而,截至目前,学术界对“中国学”这一概念,还未形成通约性认识,各执一词,相互交叉,产生了某种程度上的学理混乱。鉴于此,结合近 5 年来的学科前沿,这里将首先对与中国学相关的概念进行讨论,然后就新近涌现出的主要创新性观点、研究热点、学科发展趋向及若干不足等,进行简要说明。

第一节 最新讨论:中国学的相关概念辨析

“中国学”是一个从历史中走出来的概念。截至目前,学术界出现了若干彼此意思相近、由不同人群所倡导和使用的相关术语,如汉学、域外汉学、海外汉学、国际汉学、中国研究、海外中国学、国外中国学、国际中国学、海外中国学研究、国外中国学研究、中国学研究、世界中国学,等等。这些术语有些在语义上是重合的,基本上不需要再作区分。据此,笔者将这些相关术语进行“合并同类项”,分别将汉学、中国研究、中国学研究、世界中国学作为新的分类标签,逐一进行解析,从而为中国学做出“必要的正名”。

一、汉学/域外汉学/海外汉学/国际汉学

从原初意义上讲,“汉学”是指汉代的训诂之学,又称“朴学”,在这里专指海外偏重于历史人文领域的中国研究,自1814年法兰西学院设立汉学讲席算起,迄今已有200年历史,一直以欧美为研究重镇。学术界普遍认同与“汉学”对应的英文词汇是“Sinology”,但对“Sinology”的中译文有不同理解。一种观点认为,“Sinology”可译为“汉学”,也可译为“中国学”。例如,孙越生先生在《世界中国学家名录》中指出:“Sinology,旧译汉学,系指海外的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这是一门以汉族的语言文学、中国的古代哲学、伦理思想、典章制度和风习等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综合性学问,译为汉学,即关于汉族的学问,也指关于中国的学问……随着时间的推移,‘汉学’的内容日益扩大,涉及的学科愈来愈多,名实矛盾更加突出。编者认为,除非历史文献中已然使用和国外机构自译名之外,一般不宜再沿用‘汉学’这一旧译,而宜定译为‘中国学’。”^①严绍璁先生也赞同先期将“Sinology”译为“汉学”,近代以来应改译为“中国学”,但他同时指出“汉学”和“中国学”并不是一回事,“应该把‘中国学’作为世界近代文化中‘对中国文化研究’的核心和统摄。‘汉学是它的历史承传,而诸如现在进行的‘蒙古学’、‘满洲学’、‘西藏学’即‘藏学’、‘西域学’、‘西夏学’、‘突厥学’乃至‘渤海学’等,都是它的‘分支层面’,即它们是‘中国学’的‘分支学科’,而不能与‘中国学’并列为统一等级的学科”。^②也有观点认为,“Sinology”译成中文专指“汉学”,而不应同时译成“中国学”,因为“中国学”正如下文要说明的,其对应的英文是颇有现代感的“China Studies”,在语义上与“汉学”的区别较大,这又与严绍璁先生的看法接近。

二、中国研究/海外中国学/国外中国学/国际中国学

广义地讲,“中国研究”(China Studies)就是海外以“中国文化、中国事物、中国现象、中国问题”为对象的包罗万象的综合性研究,汉学是其中的一部分。狭义地讲,“中国研究”是指以现当代中国为研究对象的研究,也称为“中国问题研究”,即观照“现实中国”,以区别于汉学所呈现的“历史中国”。需要指出

① 何培忠.当代国外中国学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14.

② 严绍璁.关于“国际中国学”学术的人文本质与“汉学主义”的思考[C].//何培忠主编.国际视野中的中国研究——历史与现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10.

的是,“China Studies”现在也常被译为“中国学”,这时其含义就与广义的中国研究重合,这也正是笔者将中国研究与海外中国学等归为一类的原因所在。换言之,在本文的语境中,宽泛意义上的“中国研究”与“中国学”可通用。

三、中国学研究/海外中国学研究/国外中国学研究

“中国学研究”或曰“海外中国学研究/国外中国学研究”,是与以上海外中国学等相对应而存在的,至少就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外中国学研究”的学科设立动机而言,没有后者就没有前者。正如何培忠先生所说:“‘国外中国学研究’(或曰‘海外中国学研究’)是一门以海外的中国研究为关注对象的学术研究……是中国学者为了回应‘严重的挑战’而创立的学科。”^①中国学研究与中国学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并不以中国本身为研究对象,而是国内对海外中国研究的再研究,或曰“反研究”。其知识生产经历了从中国到海外再回到中国的路线图。

四、世界中国学

“世界中国学”(World China Studies)系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试图推动建立的一门新兴学科的称谓。在该所“‘世界中国学’学科建设的初步探索”的讨论稿中指出:“‘世界中国学’是在国内带有‘海外’、‘域外’、‘国外’、‘门际’等各种前定形容词的‘中国学研究’基础上,促进中国本土的中国研究与域外中国学的真正互动,突破西方现代化话语主导的‘中国知识’体系,推动从中国经验中形成本土的问题意识、分析话语和原创性理论。”严格地讲,这仅是一种学术表达,而不是一个严谨的学术概念。笔者以为,拟想中的“世界中国学”是指海内外以中国为对象的包罗万象的综合性研究,在地理范围上覆盖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和地区,在研究内容上涵盖前述概念下的“汉学”、狭义的“中国研究”和立足本土的“中国学研究”。

基于以上,笔者认为,“中国学”(China Studies)是指外部世界关于中国历史、现状及未来的分析、解释和预测,主要由“汉学”和狭义的“中国研究”构成,“汉学”聚焦历史人文领域,狭义的“中国研究”专注社会科学领域,其研究导向包括“历史中国”“现实中国”和“未来中国”三个维度。

^① 何培忠,“国外中国学研究”学科创立初期回顾[J],国外社会科学,2013(4).

第二节 创新观点:中国学发展之历史逻辑

中国学是一门关于“中国”的学问,没有“中国”,就无所谓“中国学”。从“中国”概念的原点出发,“中国学”的内涵和外延随着地缘政治意义上研究对象的变化而变化,这一过程大致可描述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中国”“中原”到“中华帝国”

“中国”一词较早地出现在《诗经》的《大雅·民劳》中,称“惠此中国”,但其“中国”实为“国之中”,而不是指真正的国家。在战国诸子百家的先秦文献中,“中国”常常与蛮、夷、戎、狄对举而使用,如《公羊传·禧公四年》称:“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桓公救中国而攘夷狄,卒荆,以此为王者之事也。”可见,这时的“中国”已被认为是“诸夏”的国家。“中原”意为“天下至中的原野”,又作“中土”、“中州”,是华夏文明和中华民族最重要的发源地,“在传统文化和近世的研究著作里,对于中原文明层累的记载使中国文化的‘中原中心论’成为中国人头脑中根深蒂固的观念”。^①而上古所谓“中国”,即指后世的“中原”,但地域不及后者。历史上的蒙古族、满族等少数民族政权皆以问鼎中原当作统治中国的象征。随着“中国”地理疆域及其影响力的扩大,始有西方人对中国封建王朝的“中华帝国”称谓。总的来看,西方“传教士汉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中原,而汉学与“蒙古学”“满洲学”“藏学”及“突厥学”等一样,仅是关于汉民族的学问。可见,本章概念下中国学的发源地在古之“中原”“中国”,其研究范围与今天相比,较为有限。

第二个阶段:从“中华帝国”到“中华民国”

在西方人看来,“人类的历史进程和中国的发展状况并没有呈现雷同的现象,4 000 多年来,中国始终保持着国家的统一和独立,它的管理理论和基本行政机构从没有发生过重大的变化”。^②按照他们的历史观,由秦至清的中国可视为与古罗马帝国一样的“中华帝国”,且存续时间更为久远。美籍华裔学者黄

① 王保国,“夷夏之辨”与中原文化[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5).

② 马士(H. B. Morse),宓亨利(H. F. Mac Nair).远东国际关系史[M].波士顿,1931:127.转引自M.G.马森.西方的中华帝国观[M].杨德山等译.北京:时事出版社,1999:92.

仁宇将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的统一的大朝代归并为三个“中华帝国”，即秦汉为“第一帝国”，隋唐宋为“第二帝国”，明清为“第三帝国”。第一帝国的政体还带贵族性质，世族力量强大。第二帝国则大规模和有系统地科举取士，形成新的官僚政治，而且将经济重心由华北的旱田地逐渐转移到华南的水田地。第二帝国“外向”“开放”，带“竞争性”和“扩张性”，与第三帝国的“内向”“保守”“非竞争性”和“收敛性”迥然不同。^①就汉学而言，中原文化依然是其研究内核，但由于蒙、满等“外族”入主中原，特别是晚清以降，大清帝国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国门，这些都促使汉学在研究视野上超出“中国”的范畴，在东亚“朝贡体系”和中西方冲突对抗的框架下研究中华帝国。

第三个阶段：从“中华民国”到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主体的“大中华”

众所周知，“中华民国”是从清朝灭亡（1912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1949年）期间民主共和国的名称和年号，简称“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从治权上讲，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各自行政，迄今尚未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基于此，国内有学者提出将“中国学”改称为“中华学”，即以“大中华”为研究对象，不仅包括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正统的大陆，而且包括已回归祖国的香港、澳门，还包括有待一统的台湾地区。以“大中华”为研究对象的“中华学”，相比现在通用的“中国学”，不仅关系到研究视野的扩大，更关系到海外学者的研究立场，而“中华学”概念尚未在海外中国学者中间普及开来，或与此有关。

从“中国”“中原”到“中华帝国”，到“中华民国”，再到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主体的“大中华”，“中国”这一研究对象在地缘政治意义上的演变，与本文概念下“中国学”研究形态的变化相对应。内在地看，这一近似线性的演进过程，大致符合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变化过程，即从“中国之中国”到“亚洲之中国”，再到“世界之中国”。

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叙述数千年之陈迹”，将中国历史划分为三段：“第一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争竞自团结之时代也……第二中世史，自秦一统后至清代乾隆之末

^① 参见黄仁宇，中国大历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年。是为亚洲之中国。即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赜竞争最烈之时代也。……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①100多年后的今天,这一思想对我们理解中国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若以历史长周期和短周期为视角重新审视梁启超的上述思想,则“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和“世界之中国”的依次演进呈循环模式。在历史周期中,从黄帝直至新中国成立(包括梁启超所处的晚清、民国),上下五千年,中国作为一个国家,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民族,中华文明作为一种文明,其地缘环境从中国到亚洲再到世界依次扩展,这是一个长周期里的大循环。在相对短的历史周期中,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又出现了一个小循环,即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是冷战期间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一员,与苏联关系恶化后则恢复到“中国之中国”的相对封闭环境当中;改革开放以后至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不再以意识形态划线,全面推进与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友好关系,但经济上的欠发达水平仍然使中国只能是“亚洲之中国”;进入21世纪,中国对外开放水平达到新的高度,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在推进世界和平发展事业中的“压舱石”和“稳压器”的作用日渐凸显,中国经略世界的意识、能力和意愿逐步显现,真正的“世界之中国”正在显示史无前例的存在感和前所未有的建设性作用。

综上,以大历史观审视,与研究对象“中国”地理疆域的不断扩大同步,中国学在研究视野上基本遵循从“中国之中国”到“亚洲之中国”再到“世界之中国”的变化过程。以新中国的60多年历史为参照,中国学在研究方法上也基本遵循从“中国之中国”到“亚洲之中国”再到“世界之中国”的变化过程,证明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循环变化模式反过来推动了中国学在海外的的发展。可见,几个世纪以来中国学的发展与两个因素呈正相关,两者共同衍生出中国学发展的历史逻辑:一是“中国”这一研究对象在地缘政治意义上的扩大,二是大历史观下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扩展。换言之,“中国”的疆域越大,中国学的研究范围越大;从中国历史的长周期和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的短周期看,中国越开放、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越密切,中国学的研究视野越广阔。

^①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之六中国史叙论[M].中华书局,1926:11—12.

第三节 研究热点:中国崛起与中国学发展

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学在“中国崛起”的语境中获得了新发展,成为国际学术界增长迅速的“显学”之一。所谓新发展,主要体现在国内外两个方向上:一是在海外发生的汉学与狭义上中国研究(现当代中国研究/中国问题研究)的融合现象,即“历史中国”与“现实中国”的对接;二是在国内出现的“中国学研究”学科建设新进展,以及关于“世界中国学”学科构建的新倡议。

如前所述,汉学专注于汉民族的语言文学、古代哲学、伦理思想、典章制度和文化风习等,人文色彩浓厚,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并在 21 世纪实现了复兴。狭义上的中国研究是以现当代中国为对象的研究,即“中国问题研究”,冷战以来逐渐在西方兴起并在 21 世纪获得了蓬勃发展。正如美国学者所言:“在美国,目前在美国大学和智库大概有 3 000 人研究中国问题……美国情报部门一向关注问题研究,中央情报局、国防部等机构差不多有一两千人研究中国问题……美国一些著名的大学现在都有研究当代中国的中心或者项目,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一些州立大学、地方大学、私立大学也开辟了中国研究领域。”^①

在中国崛起背景下,本来是两条“平行线”的汉学与现当代中国研究,逐渐有了发展交集。两者的“交集”体现在:一方面,汉学家开始关注并发掘中国传统文化在全球化时代的价值体现,或曰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和价值观念之于当代的意义和作用,汉学以“历史中国”观照“现实中国”,以“传统中国”理解“现当代中国”;另一方面,在海外的中国问题专家们对于西方理论和知识框架不能解释的一些中国事物、中国现象、中国问题,越来越倾向于回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去寻找答案,狭义的中国研究以“现实中国”映衬“历史中国”,以“传统中国”溯源“现当代中国”。归于一体,汉学与狭义中国研究的关键性融合就在于两者对“中国价值”的现代理解、分析和认识,即“中国价值”将“历史中国”和“现实中国”、“传统中国”和“现当代中国”连接成一个完整的中国,中国学也因此获得了具有兼容性的整体发展。

在汉学与狭义中国研究的融合日渐显现、中国学在海外获得新发展的同

^① 梁怡,王爱云.西方学者视野中的国外中国问题研究——访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沈大伟[J].中共党史研究,2010(4).

时,以之为依托的国内中国学研究也进入了发展快车道,其独立学科地位得到巩固,关于学科体系包括研究对象、研究任务、研究目的、研究方法及机构设置等的探讨和实践走向深入。学术界普遍认同,中国学研究以在海外的中国学为研究对象,追踪其发展脉络、研究热点和特点及不足等,梳理中国学学术史,勾画其在全球范围内的资源网络和实力布局,科学把握中国学发展规律。中国学本身是跨学科、多学科、跨文化的,因此,中国学研究需要综合运用历史学、政治学、传播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具体研究方法主要包括三个:一是李学勤较早提出并广受认可的学术史方法,二是文献学方法,三是以乐黛云、严绍璦为代表的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研究方法等。^①

与中国学相关的机构设置起步于 20 世纪 70 年代,进入 21 世纪后也获得较快发展。目前,在全国范围内陆续出现了 10 余个中国学研究中心或研究所/室,其所属研究机构或大学主要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1971 年)、国家图书馆(1995 年)、北京语言文化大学(1995 年)、北京外国语大学(1996 年)、华东师范大学(1996 年)、中国人民大学(2006 年)、中央编译局(2009 年)、上海社会科学院(2012 年)等。其中,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是唯一的实体研究机构;华东师范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是国内最早也是唯一设立专门学位点的机构,依托该校历史系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博士点,开展“海外中国学史研究”方向的硕博培养工作,侧重海外(主要是美国)中国史学的研究。另外,2013 年,以“推动本土中国学的建立和完善”为职责的四川大学中国学中心成立,在国内首倡所谓“本土中国学”,“是以中国,特别是现当代中国为整体研究对象,主要研究中国文明的发展规律和特点,并服务于当今和未来中国发展的综合性学科”。^②这一界定与本文着眼于海外的“中国学”有所不同,故笔者在讨论国内中国学研究发展动态时并不将其列入其中。

关于“世界中国学”学科构建的倡议,由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 2014 年提出。“世界中国学”这一概念之所以能够引起学术界关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世界中国学论坛”在海内外的声名。世界中国学论坛是一个高层次、全方位、开放性的学术性论坛,目前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上海市政府主办、上海社会科学院承办。该论坛旨在为海内外中国学界提供对话渠道和

① 朱政慧.近 30 年来中国学者的海外中国学研究:收获和思考[J].江西社会科学,2010(4).

② 王允保.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四川大学中国学中心副主任何一民谈中国学.[2015-2-10].四川大学新闻网, <http://www.scu.edu.cn/news2012/cjjj/webinfo/2013/03/1343288907432080.htm>.